

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讯

第6期（总第402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23年6月5日

-
- ◆ 传统村落保护，总书记这样强调.....新华网（1）
 - ◆ “大食物”的启示.....任继周（3）
 - ◆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陈锡文（4）
 - ◆ 农村经济学术与政策观点综述.....郭书田（7）
 - ◆ 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初心和使命.....景天魁（18）
 - ◆ 话说萧克.....徐庆全（22）
 - ◆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丁玉华（28）
 - ◆ 籽粒苋作为蛋白质饲料源以取代豆粕饲养肉牛初步显示良好前景.....卢洪华 孙鸿良 岳绍先（32）
 - ◆ 总书记这样和青年谈心.....新华网（36）
 - ◆ 今日小满.....李文平（38）

传统村落保护，总书记这样强调

新华网

4月27日，2023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名单公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传统村落，多次对传统村落保护作出重要指示。

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具有成百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形载体。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各具特色的宅院民居、自然朴实的农业景观、耕读传家的祖传家训、邻里守望的乡风民俗……这些中华文化的鲜明标识汇聚在传统村落里。

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传统村落在一代代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承载起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村落保护作出具体指导：

——在乡村振兴中改善村民的生活，形成传统村落内生发展动力。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色，保留传统村落历史风貌，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古民居、古建筑等有形的历史文化载体。

大别山青龙岭山脚下，坐落着一个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河南省新县田铺乡田铺大湾。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田铺大湾考察时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

——传承活态的乡土文化，挖掘、继承、创新传统村落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洱海之畔，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是一个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典型白族传统村落。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全国上下勠力同心，推动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取得积极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层面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目前已有 8155 个传统村落列入名录、实施挂牌保护制度，53.9 万栋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得到保护，4789 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展。我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附：

2023 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

- | | |
|-------------------|--------------------------|
| 1. 北京市密云区 | 21.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 |
| 2. 天津市蓟州区 | 22. 海南省文昌市 |
| 3.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 23. 重庆市黔江区 |
| 4. 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 | 24. 重庆市江津区 |
| 5. 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 | 25. 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 |
| 6.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 26.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 |
| 7.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 | 27.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
| 8.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 | 28. 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
| 9.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 | 29.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 |
| 10. 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 | 30.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 |
| 11. 安徽省宣城市泾县 | 31.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 |
| 12.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 | 32. 甘肃省陇南市两当县 |
| 13.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 | 33.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 |
| 14.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 | 34.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 |
| 15. 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 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 |
| 16.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 | |
| 17.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 | |
| 18.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 | |
| 19.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 | |
| 20. 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 | |

（来源：新华网，2023 年 4 月 27 日）

“大食物”的启示

任继周

前些天（日期忘记了，老人健忘，请见谅），某一职能部门在央视发言，说了一段话：目前，主食越来越不“主”，副食越来越不“副”，要有“大食物观”的概念。这令人高兴！这就是半个世纪前侯学煜的“大粮食观”，当时我与先师盛彤笙同声赞同。其主调是我们传统的五谷食物不断减少，其他副食，主要是肉蛋奶、果蔬、水产品增加。这是大家日常熟视无睹的朴素真理。

主、副食大幅度相对增减的意义重大：它是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人均谷物消费相对减少，而肉蛋奶消费相应猛增，这也正是我矢志开拓草业科学的动力。

我国人民动物性食物消费大量增加，食物结构发生革命性改变，而农业“以粮为纲”结构却没有实质性转变。动物性食品供不应求，因此曾发生国际性的中国人抢购奶粉，甚至引发国际奶业市场动荡。我在2013年著文提出“我国农业结构不改革不行了——粮食九连增后的隐忧”，此文引起社会关注。九位院士改写为建议书报送中央，也得到正面回应，我们深感慰藉。

当时人均口粮与畜禽饲料之比，按食物当量计为1:3，即畜禽饲料是人口粮的3倍。我国仍强力增加粮食生产，吃不完就大量库存，最后成为陈化粮，损失巨大。而饲料不得不大量进口。每年进口近一亿吨大豆，主要用来榨油、做豆粕。此外进口鱼粉，2021年我国鱼粉进口量创新高，同比增加28.34%，其中12月份进口93935吨，同比增加40.97%，增势惊人，反映国产饲用蛋白质的不足日趋加剧。能量饲料，如玉米、干草进口也大有可观，此处不遑备举。

优质饲用作物，其中包含了多种优质牧草，它们无论饲用蛋白还是能量的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都比籽实作物多四到五倍。我国从暖温带至亚热带、热带地区，不乏亩产10吨鲜草的高产饲用作物。缺点是水分多，营养物质稀薄，对高产动物，如奶牛，需精料补充。作为补充饲料，压力就小多了。

去年，我国有些地方，雨季来迟，影响小麦籽实成熟，农民就青割做饲料，增加收入，曾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要问责农业部门，这未免有些少见多怪。有些国家就种冬小麦、黑麦等在冷季和早春作牧草利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国内也在沿黄灌区和河西地区做这类研究和示范。

现在，粮食已十九连增，饲料生产情况如何？首先，国家统计局需将饲料与口粮分别统计。口粮主要是稻米与小麦，属战略物资，得到保证以后，饲料作物要尽可能安排多生产，少进口。但必要的进口势不可免，这是我们了解现实的基础。否则将口粮与饲料混为一谈，难以做出农业的战略决策。18亿亩红线，是一块玉璞，还得精心雕琢，“玉不琢不成器”。

我国国门大开，要充分用好这一政策，不要再受“万事不求人”自给情结束缚。现在数字化管理已经普遍施行于各个行业，食物生产这样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尤需抓紧办理。十年前，我们就提出这个建议，至今未见落实。建议主管方面多加关注。该种什么，种多少，把我国有限且紧缺的水土资源用在刀刃上。我国“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农业语境就是“农业结构改革”。生产什么农产品要针对社会需要。我国消费的奶类、肉类等畜禽产品需要多少精饲料，多少粗饲料？希望尽快弄清，落到农业结构的改革的实处，这是大国崛起的农业基础。

（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2023年5月7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陈锡文

【阅读提要】：

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两者既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建设农业强国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身是一致的。

城镇有城镇的特有功能，乡村有乡村的特有功能。作为一个共同体，城乡是融合在一起的，只有把各自的特有功能都发挥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才是健康的。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但必须持续推动发掘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

辩证看待农业强国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系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牢牢把握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着眼于增强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底气，守住国家安全的底线。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两者既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建设农业强国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身是一致的。作为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如果不建成农业强国，在吃饭问题上还会被人“卡脖子”，我国现代化建设就难以真正掌握主动权。中国的自然禀赋决定了人多地少，而农业又是所有产业中的一个短板，从这个角度上讲，建设农业强国是一项艰巨任务。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世界上真正强大、没有软肋的国家都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不能只从经济上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大国，尤其是人口大国，必须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从农业强国的特点和当今世界的表现来看，农业强国必然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已经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未必是农业强国。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不能靠自身力量解决本国国民的食物供给问题。当前，我国虽然实现了口粮绝对安全，但大豆、油料等自给率偏低，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总体上，我国粮食供给上存在总量不足、“北粮南运”粮食格局不平衡等隐患，饲料、油料、糖料“三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突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当前，我国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问题，仍处在一个复杂的背景下，同时基于我国粮食总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的状态，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必须落实好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绷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在口粮与其他食物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替代和转换关系，我们要有统筹观念，不能只满足于口粮安全，还要看到其他重要食物供给方面的缺口、存在的问题，增强自身能力、守住自身底线。

乡村振兴重在发挥乡村的特有功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动乡村振兴，不仅是农村和农民的事，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

乡村振兴有两大目标：一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掌握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主动权；二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使农民富裕幸福，农村和谐秀美。前一个目标是“国之大者”，后一个目标是“民之所盼”，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同步推进，才能相得益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五大振兴”是总要求，“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总目标。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提高乡村专业人才的比重，更要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科学素养；要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振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发展农民需要的各种新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提高农民推进乡村振兴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还要重点发挥乡村的特有功能。

城市和乡村各有不同功能。在此可类比一个人，人有五脏六腑、四肢五官，它们各有各的功能。国家也是如此，城镇有城镇的特有功能，乡村有乡村的特有功能。作为一个共同体，城乡是融合在一起的，只有把各自的特有功能都发挥好，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才是健康的。

城市的功能更多体现为在要素集聚和融合的基础上去推进各种各样的创新。乡村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它具有城市不具备但却是整个国家发展不能或缺的特有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守护和传承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脉，即巩固农业基础、守护青山绿水、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乡村振兴不能简单地比照城镇建设的路子。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搞新农村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注意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不能照搬照抄城镇建设那一套，搞得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说把乡村搞得多么漂亮，建设得跟城市一样，而是重在发挥乡村的特有功能，注意生态环境保护，注意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

更进一步看，乡村在发挥其特有功能的同时，也要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很多措施，包括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等，同时还明确提出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切实落实好这些政策举措，就一定能加快提升农民的富裕程度。

同时，对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不能低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衡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和城乡居民分布格局与十几年前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以往的经验未必适合当下和未来。应抓紧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

前景进行规划，以使这两个指标与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状况相称。

以数字乡村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是“四化同步”的短腿，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也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头重头在“三农”，必须向农村全面发展聚焦发力，推动“三农”与国家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前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没能用上信息化，现在我们具备了这个条件。

信息化技术发展了几十年，有力促进了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并已经融入农业领域，许多国家将农业信息化作为农村建设的必经阶段。2016年，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比城市，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的短板。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农村互联网建设步伐，扩大光纤网、宽带网在农村的有效覆盖”，并提出可以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发展智能制造，带动更多人创新创业；可以瞄准农业现代化主攻方向，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帮助广大农民增加收入；可以发挥互联网优势，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困难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可以加快推进电子政务，鼓励各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壁垒、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等等。连用几个“可以”，阐明了信息化在赋能“三农”发展中大有可为，既可以提升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能改善农民就近可及的公共服务。

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但必须持续推动发掘信息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为乡村振兴插上腾飞的翅膀，让数字技术在乡村的广阔天地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将在乡村的数字化发展中收获满满，农业强国建设必将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

（作者：原中央农办主任。来源：湖北日报，2023年5月4日）

农村经济学术与政策观点综述

郭书田

从事学术和政策研究，需要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毛泽东说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实践中验证和发展理论。理论是政策的依据，而政策是党的生命。正确的政策来源于调查研究。“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自1979年农村改革以来，随着改革的发展，在调查研究中形成个人对农村经济的若干学术与政策观点，大部分刊载在报刊和专著之中，其中有一部分曾以口头或文字形式、单独或与其他老同志一起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述，受到重视或采纳，兹综述如下。

1、最早主张农村所有制不能纯，而应多元化。农村的公有制，是以集体所有为主。国有经济占的比重约为4%，而在国有经济中又有个体和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包括土地的集体所有和乡镇企业中的乡办与村办集体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集体所有的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个体和私营企业也实行股份合作制，有“殊途同归”之势。

2、最早提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叠加在一起，形成坚固的二元壁垒，使农民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世袭农民”。二元结构早已有之，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采取城乡两种政策和两种制度安排，凝固和加剧了二元结构，成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措施，是历史的重大转折。

3、最早提出粮食生产商品化和经营市场化。粮食虽然是关系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经济繁荣的“特殊产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则是“基础中的基础”，但不能也不应改变粮食的商品属性。

4、在提出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时，必须同时提出农业现代化，并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使“二化”成为“三化”。否则，在农村内部会形成“小二元结构”，即先进的工业与萎缩的农业并存，发达的城镇与落后的农村并存。

5、认为1985年粮食大幅度减产（6.9%），不是像中央有的领导人说是由于自然灾害不可避免、调整产业结构是必要的、有些地方领导人忽视粮食生产的“三条”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对上年粮食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至采取不适当的政策，实行“倒三七”价格，从而打击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特别是新商品粮地区和“三靠”（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而无征购任务的村，使农民收入大幅下降的结果。

6、不赞成在农业丰收时只讲“政策好”和“人努力”的主观因素，不讲“天帮忙”的客观因素；而在农业歉收时，则只讲“天灾”的客观因素，不讲“政策”的主观因素，这是在总结工作中常见的毛病，是不实事求是的，自然不会使人信服。

7、认为农村乡镇企业出现的股份合作制，是农民的一个创造，“不伦不类”和“非驴非马”本身

就是一个创造，驴与马杂交就能产生骡子，具有杂交优势。从生物学说，杂交的遗传性需要经过若干代才能稳定，而利用杂交优势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毛泽东在讲到音乐可以中西融合时，曾经说过“非驴非马”就是一种创造。

8、认为温州发展民营经济（主要指个体与私营经济）以及出现的股份合作制创造的“温州模式”，是在当地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更不是“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动摇”。“红红火火闯九州，走遍天下温州人”。温州的经验证明，只要把生产力中最重要和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充分发挥出来，就会把潜在的生产力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创造出人间奇迹。

9、认为“民工潮”（以后改为“农民工”）是对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及两种户口的户籍制度的重大突破，是农民为求生存的一种勇敢的自发行动，具有“突围”性质。“农民工”是社会学讲的“推拉定律”的反映，即农村有庞大的富裕劳动力，是推力；而城市建设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是拉力，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农民工”是农民的“黄浦学校”，造就一批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精英”，同过去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去法国勤工俭学具有同样的意义，他们为了中国的富强去学政治革命的本领；而农民工去学经济与技术革命的本领，最终也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农民工”在获得了生产经营的技能，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市场信息之后，返乡“第二次创业”，带动周围农民致富，就是充分有力的证明。一大批农民企业家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

10、认为从“盲流”到“民工潮”到“农民工”称号的三次变动，反映了人们对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认识上的变化。“盲流”显然是歧视性的，“民工潮”也有贬意之嫌，而“农民工”本来已经成为城市工人，而且是建筑业与服务业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是“农村户口”，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国民待遇”，在就业、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歧视，仍需使用“农民工”的称呼，使农民工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是最大的社会不公。

11、认为中国农民是贡献最大而牺牲与奉献也是最大的群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农民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由农民提供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农村为突破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农民仍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进城的“农民工”成为城市的“边缘化”群体，农民工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还不能按时发放，生产与生活条件极差，又无社会保障。而“农民工”子女上学又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视，从而使“农民工”形成双重“边缘化”群体，特别是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在幼小的心灵中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12、认为不能笼统地说农民是农业投入的主体，这是不确切的。谁投资谁就是主体。农业投资包括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多元化的主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在二元结构下，农业的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生态环境恶化，抗灾能力下降，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属于公益性事业，国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是投入的主体。片面强调农民是农业投入的主体，掩盖了二元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弊端，造成城乡差别过大的严重后果。

13、认为开征农林特产税（后改为农业特产税），是“鸡飞蛋打”之举，既不能实现平衡和解决粮食效益低的问题，又增加了农民负担，税率比农业税高好几倍，最高的达到15%。原来农民承认农业税的税率是低的（3%左右），因而有“头税（农业税）轻，二费（村三项提留和乡五项统筹）重，各种摊派无底洞”之说，在开征农林特产税后，农民说“头税也不轻，二费重，各种摊派无底洞”。而且由于

特产的品种多，又很分散，征税难度大，许多地方变成“定额税”或“人头税”，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在 2004 年取消农业特产税时认为让此税“寿终正寝”。

14、坚决反对开征农业“什一税”。在 1989 年中央为解决两个失调（工农业失调、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失调）问题，采取“整顿治理”方针，而时隔不久，有几位领导人认为农民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的实惠最大，理应为国家多做贡献，因此根据有的“专家”建议，提出对农业实行“什一税”，即把税率由 3%左右提高到 10%，而且说历史上就是这样。这种主张违背中央在“整顿治理”中加强农业的方针，会对农业和农民造成新的伤害。

15、认为 1989 年出现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基建投资过大引起的，而不是由于市场粮价上涨引起的，更不是“源头”。把粮食上涨说成是“通货膨胀”的源头，是本末倒置的。粮价上涨是粮价过低的必要反弹，有利于改变粮食生产徘徊的局面和增加农民收入。

16、认为 1989 年京、沪等大城市出现的“抢购风”从而停止了价格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是由于粮价上涨带动的，而是价格改革的设计不当出现的。当时价格改革的设计是大幅度调整和提高原材料工业品和能源的价格，必然拉动其他加工工业品（包括各种消费品）的价格，在消息传出后引起群众的恐慌，于是出现“抢购风”。

17、认为 1993 年的粮价上涨，不是生产问题，而是流通问题。当年上半年仍存在卖粮难（特别是玉米）问题，说明不是供给不足，南方早稻有些减产，也不致影响全局。流通问题主要表现在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粮食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调整库存，采取了逆向的措施，在粮价低时抛售，在粮价高时抢购，从此看出推进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才是出路。

18、认为出现收购棉花的压级压价现象，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造成的，甚至还会出现农民自焚棉花的事件，不从根本上改革农产品的购销体制，农民遭受的痛苦是难以消失的。

19、认为农民承担村三项提留和乡五项统筹费是“合法”并不“合理”，因为城市居民没有这些负担，而农民负担重，源头在北京的中央各个部门。中央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每年都要开几次会，发几个文件，要求把负担控制在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 5%，而且采取做预算、发监督卡、审计三项行政措施，大大增加了成本，而效益甚微，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无济于事。治本之策在于调整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精简工作人员，改革多部门和多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先拆庙后搬和尚，不拆庙老的和尚出来了，新的和尚还会进去，而且比老的还要多。这就是多年来机构改革出现的“精简——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为此，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整体推进。

20、认为对安徽实施的“费改税”改革的评价不能过高，应保持低调，既不是“治本之策”，更不是农村“第三次革命”。只是把费并入税，而把税率由 3%左右提高到 7%，外加 20%的教育附加费为 1.4，合计为 8.4%，怎能减轻负担呢？而且计算农业税的工作量很大，难以精确，农民为了避税，还会以少报面积抵抗。这种“改革”自然不会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21、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民在改革开放以来继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与异军兴起的乡镇企业之后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是亿万农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保证。那种认为农民文化素质低，民主意识差，推行自治是“超前”的“乌托邦”，是对农民的错误评价，是不相信农民的心态表现。四川遂宁县一位 102 岁的小脚老妇由她的孙子背着去投庄严、神圣、伟大的一票，说明农民当家作主的诉求是十分强烈的。在土改时，不识字的农民，在推选农民协会主席时，曾用点豆子的办法计票，说明农民实现民主的办法多得很。至于出现参与率和投票率不高以及在选举中为宗族以及其他恶势力的操纵，是由于民主程

序不规范或不透明造成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党支部和乡镇政府的不当干预，也是造成农民不能很好行使“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根源。

22、认为供销社和信用社的改革走入迷途，是合作制的异化。本来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既有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有相配套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合作社体系。但在进入土地等生产资料变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供销社成为第二国营商业，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虽然多次强调通过深化改革，使其恢复“三性”（组织的群众性，管理的民主性，经营的灵活性），成为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但由于阻力甚大，始终未能到位。1998 年以来，不再强调恢复“三性”，也不再说是农民的合作组织，而只是说为“三农”服务，离合作制越来越远。对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原始资本不承认是农民的财产，是对农民财产的又一次“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好“另起炉灶”，另行建立以服务为宗旨的合作组织。供销社和信用社的商业化，背离了合作制的原则，是改革的失败，也是又一次向农民欠下了一笔债。大肆宣传供销社与信用社扭亏为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增加农民支出和减少农民收入为代价的，不值得炫耀，与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相悖。当然通过内部加强管理，激发机制，也是可以扭亏为盈的。

23、认为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国务院领导人的一项错误。合作基金会是在信用社“变性”（由姓农变为姓商），不能为农民提供信贷服务的情况下，被迫自发产生出一种新的互助合作性质的小额金融组织。虽由于受到乡、村干部的种种干预，在管理中出现了不良贷款以及安置干部亲属等混乱问题，但认为它是扰乱金融市场的“罪魁祸首”显然是夸大其词的，为此采取一刀砍的办法更是不妥的，以至各地出现农民挤兑现象，留下来很大的后遗症，使农村金融渠道更加狭窄和单一。农民贷款难更加突出，不少地方出现地下的“高利贷”（利率高达 3%），吃亏的还是农民。我们既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各地经营人民币信贷业务，不允许农民组织合作性质的金融机构，是对农民的不公，应还农民以“国民待遇”。

24、认为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把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无偿使土地等生产资料成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是像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指出的只是急了点、工作粗糙了点的问题，而是对农民财产的剥夺，是原则性的错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25、认为在推行土地的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使人民公社解体时，在“谈合作色变”（农民害怕以合作名义归大堆或平调他们的财产）的背景下，未能同时把社区的合作组织健全和完善起来，是个失误。当时提出建立统一经营与分户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成为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实际上许多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没有或很少企业，实际是“空壳村”，而“统一经营”是徒有虚名的，无法为家庭经营的农民提供有效的产前和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使农民仍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难以抗御自然和市场的风险。

26、认为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保证，是农民与政府对话的桥梁，是农民与公司谈判的纽带。这是因为十分分散而经营规模又十分狭小的农户，虽然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但缺乏抵抗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而且还有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及集体企业的产权主体缺损，农民难以当家作主，资产流失十分严重，使农民利益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也加剧党和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影响党的执政地位与巩固工农联盟。推行社区股份合作制有利于使农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行使决策参与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管理人员选择权等“四权”，

真正成为主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具有双重身份，真正成为“联合体的自由人”。

27、反对“公司+农户”的提法，认为公司是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农户”容易形成公司剥削农户，公司利用手里的资本，由农民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将农民创造的剩余转为公司的超额利润。因此应当修改为“公司+合作组织+农民”，即农民通过为自己服务的合作组织与公司形成互利双盈的利益共同体，实行利润返还办法，并依法保护农民的权益，合作组织成为农民的组织依托。

28、反对“农业产业化”的提法，因为农业是第一产业，本身就是产业，又如何“化”呢？以后约定俗成，修改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了“经营”两个字，能说得过去，严格讲也不准确。实际指的是把农业的原料生产延伸到农产品加工与流通领域，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经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工商一体化”。这正是前苏联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恰雅诺夫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所阐述的农业纵向一体化的理论。有的新闻媒体宣扬“农业产业化”是山东潍坊的创造，也不符合实际，事实上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在我国早已有之，就是没有推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一个大型的农工商一体化集团。改革开放以来，学习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的经验，在全国不少地方推行农工商一体化试点。最早在畜产品方面不仅试行经营一体化，而且探索管理一体化。

29、认为在修改后的《村民自治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发包方，是不妥当的。因为村民委员会是社区自治的社会组织，土地管理属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责，村民委员会成为土地的发包方，又是政经不分或以政代经，削弱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管理职能。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三位一体，各司其职，干部可以交叉任职，重大问题可以召开支委会、村委会、管委会的联席会讨论，但各自的职能不能混淆。

30、认为《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都是把行使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经营与管理定为由乡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行使，是有缺陷的。当时是由于有些村缺乏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因此加了一句“或村民委员会”。但是村民委员会设在行政村，相当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也就是所有权的范围由生产小队扩大为生产大队。这样规定无形中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形成并长期坚持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由生产小队“悄悄地”过渡为大队，把所有权的范围扩大和拔高，是中央曾经多次反对“穷过渡”的重新表现，在农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难以有效保障的情况下，更容易造成土地的流失，这又是一个涉及农民权益的原则问题。

31、认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是能独立的法人，具有法人资格，在立法中要加以明确规定。目前，由于合作组织不是法人，无法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而登记机关十分混乱，有的在工商管理部门作为企业；有的在民政部门作为社团；有的在农业部门作为服务组织。虽然在《民法通则》中只有机关、社团、企业、事业四种法人，无合作社法人，但应通过修改法律增加合作社法人。因为合作社既不是企业（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又不是社团，而是农民按合作制的原则自愿组织的合作经济组织。而且一定应把登记机关与管理机关统一起来，不要人为地形成“两张皮”，制造矛盾。把合作社作为企业是不妥当的，至于合作社单独兴办或与企业合办的公司是企业，由公司法规规范，照章纳税，自然应由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并管理。

32、认为中国的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说到底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在土地变成集体所有以后，土地

不断流失，出现失地农民，便成为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发展，除了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军事设施占地外，大量流失的土地系经营性质，如开发区等。据统计，各地各种开发区的面积比地级以上数百个城市面积还要大。虽然中央多次强调保护土地，要求做到“总量动态平衡”，使耕地不再减少，并制定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但是土地流失问题仍很严重。近10年来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降为18.3亿亩，减少1.2亿亩，人均耕地已下降为1.4亩。“三无”失地农民（无地、无就业门路、无最低生活保障）已达4000多万人，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解决土地流失问题，学术界强调要明晰集体所有产权，包括主张私有的，也有主张国有的，但出现流失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与法律赋予政府的职能。即政府垄断一级市场和经营二级市场，从中获得巨大的差价收益，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来源，即“以地生财”。同时，在基层，不论是乡或者是村，在这种体制下，不但无力抵抗，而且还要严格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在遭到来自农民的反反对与抵抗时，甚至动用民兵等武力，强制推行，从而引起严重的抗争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执政地位的重大因素。因此必须修改法律和调整政府职能，即放开一级市场，退出二级市场，不要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真正把精力放在依法按照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原则管理土地。

33、认为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的取向，既不是私有化，也不是国有化，而是在实行所有权与承包权的两权“分离”作为集体所有的实现形式。因为国有化等于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剥夺，私有化等于又一次“土地改革”，出现私有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同时还应在所有权与承包权“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提倡承包权与使用权的“二次分离”，或称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权分离”，这样有利于在所有权、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促进使用权的流动与转移，形成大户，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力。因为我国的土地产出率是不低的，特别是复种指数高和大规模推进设施农业建设的地方，土地的单位面积效益是很高的，但由于经营规模异常狭小，而劳动生产率很低，成为收入难以大幅度上升的最大制约因素。

34、认为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政府用强制手段以低价征用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又以高价出售给开发商以及其他用地单位，从中索取暴利，并为腐败分子的寻租行为提供了温床。目前在使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中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一次买断，使农民失去土地；第二种出租，约定每年为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租金，使农民不失去土地，但与土地的收益不挂钩；第三种是入股，即把土地折成资本转为股本，能够从土地的增值效益中按股分红，使农民与企业形成利益共享的经济体。第三种办法农民容易接受。

35、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具有双重功能，除一般的生产功能外，还有特殊的社会保障功能，这是农民珍惜土地而不愿轻易放弃承包权的根本原因，于是出现“两栖农民”，即把使用权转包给本地或外地的农户经营，不但不收取转包费，而且倒贴一些资金给转包户，以能保留对土地的承包权，即自己不种地又不放弃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其理由有三：一是怕政策变，对中央多次重申承包权长期不变的政策不相信，原因是地方政府经常以“红头文件”征收土地，因而有“一号文件很好，二号文件好狠”之说。也有流传甚广的对联：“共产党的恩情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共产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横批：“政策多变”。二是做生意有风险，一旦亏损甚至破产，由于有承包地就能有退路。三是害怕连续几年天灾使粮食减产而在上场买不到粮食，由于有承包地还可种粮食，不致饿肚子，总之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农民这种心态是很实际的，应该予以充分理解。因此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全面建设起来的情况下，保留“两栖农民”是十分必要的，不能以为他已进城务工经商就强制收回承包地。

目前的政策是凡进入城镇有固定住处、固定工作、固定收入的，是否交回承包地，可由农民自己选择；但是进入城市的，则必须交回承包地。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不妥的。都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不要强迫他们，应该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同时看到，由“世袭农民”转为“两栖农民”，是农村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进步。在制订《物权法》时，应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确定为物权性质，给以法律保护。

36、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体制问题，把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志，以至形成 GDP 拜物教。因此完全赞成实行“绿色 GDP”（GDP）的指标体系，虽然在计算上扣除资源与环境损失成本，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是技术问题。同时也赞成建立补偿机制，受益方应对受损方给以必要的补偿，不能让受损方吃亏。

37、认为人类在经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之后，进入了生态文明时代，也可把后工业文明称之为生态文明，因为在工业文明时代，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带来对资源与环境的巨大破坏。这是由于人的错误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社会机制造成的，以至出现了生态危机，由此引起生态革命，最终实现生态文明。

38、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的农业文化，是东方农业文化的发源地，也包括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这些文化反映在许多有巨大意义的农学著作之中，如《齐民要术》等，对世界农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农业具有许多保护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经验，是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重要农业文化资源。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也都有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传统。如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创造的东巴文化就是最突出的典型。应当把天地人融为一体的哲学思想融入当今现代化建设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

39、认为农业现代化应包括生产装备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现代化，生产管理的现代化以及生态环境的现代化等四项，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土地产出率、商品率、劳动生产率、资金利润率、资源有效利用率等五项。把发展现代农业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的农业模式。

40、认为中国的传统农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引进了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主要是三类：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发展了农畜品种的改良技术；二是李比西的矿物营养理论，发展了化学肥料及施肥技术；三是动力机械理论，发展了动力农业机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种现代农业技术也带来损害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已引起广泛的关注，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把传统农业精华与现代农业技术有机结合，把农业发展与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走生态农业之路，是农业发展的方向。中国的生态农业是生态经济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

41、认为农业的功能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即由传统的物质生产功能转向生态功能、能源功能、保健功能、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等，除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外，还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如旅游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渡假农业等。后者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农业的效益也日益多元化，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文化效益等。

42、认为“生态赤字”比“财政赤字”更可怕。目前我国仍处于巨大的“生态赤字”状态，生态环境状况局部有所改善总体继续恶化。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仍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水土流失；二是荒

漠化（包括北方的沙漠化和南方的石漠化）；三是草原三化（退化、沙化、碱化）；四是酸雨；五是化肥农药农膜等面源污染；六是畜禽粪便点源污染；七是农作物秸秆燃烧的污染；八是生活垃圾以及其废弃物的污染等，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很大威胁。应把保证“生态安全”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43、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靠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将是人类第六次重大的科技革命。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技术、克隆技术、酶技术、发酵技术等，将使农业发生根本性转变。以生物技术为中心，使植物——动物——微生物形成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最终实现零废弃物、零排放、零污染的目的。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基因库，既要重视保护我国的生物基因，又要防止国外有害生物的入侵。

44、认为现代农业的结构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一是从只生产原料的初级产品转变为生产加工后的最终产品，农产品加工率和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将大幅度增加。二是在农业内部从以种植业为主转变为以养殖业为主，养殖业包括畜牧业与渔业。三是畜牧业将由副业——独立产业——支柱产业的第三阶段转变为第四阶段的主导产业，其比重超过种植业。四是在畜牧业内部从以养猪为主转为包括牛、羊、兔、鹅等草食畜牧业为主，要特别重视高原的牦牛和南方水牛的品种改良，使中国成为畜牧业大国——畜产品大国——畜产品加工大国——畜产品出口大国。五是在种植业内部在保证粮食的基本需求条件下，大力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包括棉、油、糖、麻、桑、果、茶、菜、药等。六是种植业的作物，包括粮食作物、饲料作物、工业原料作物、能源作物、医用作物等，应特别重视中草药的生产与加工。七是在重视食品生产的同时，重视天然纤维制品的生产，包括棉、麻、丝、毛、绒、皮、羽等。

45、认为保证粮食安全，也就是食物安全，既要基本立足于国内，又要在国际化背景下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可以考虑鼓励和支持在土地资源广阔的国家建立粮食生产基地与粮库，在国内需要时进入国内市场，也可从事国际转口贸易，为解决世界粮食供给短缺问题做贡献。就像浙江在黑龙江与安徽建立粮食基地一样。

为确保粮食基本自给，实行两个 16 亿与两个 400 公斤的计划。两个 16 亿是到 2030 年人口达到峰值为 16 亿，用 16 亿亩面积播种粮食；两个 400 公斤是每亩产量达到 400 公斤，人均消费量 400 公斤，这可能是一个偏高的指标，可随着实际的变化作适当的调整。

46、认为保持 GDP 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在投资、出口、消费三个要素中，关键是消费的拉动。这是由于中国有 13 亿人口的国情，而且目前消费水平低，消费潜力巨大。在拉动内需中，农村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近些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社会消费总量中农村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目前约占 1/4 左右。也就是说在 13 亿人口中的 9 亿农民，每 4 个人消费只相当于城市 1 个人的消费。而且农民人均纯收入包括实物收入在内，不全是货币收入，而且还要投入再生产，这与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同。因此应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战略位置，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吸纳农业劳动力，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中西部，把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为拉动内需创造条件。

47、认为发展农村经济，就是坚决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全方位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财政、信贷、税收等多方面向农业和农村倾斜，真正把各行各业都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和新农村建设的轨道上来，并以此作为考核各级党政领导的依据。

48、认为乡镇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基本途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而与城市工业化不同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即产业结构以轻工业为主而不是以重工业为主；投资结构以农民投资为主而不是以国家投资为主；劳动力结构以农民为主体而不是以市民为主体；地域结构以集镇为主，而不是以城市为主；企业结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不是大型为主。今后发展将不会再走初期那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

路，必须避免小而分散又污染和不安全的缺陷，相对集中于小城镇，并与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就地就近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成为吸纳农业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阵地，这样也可缓解大城市人口的压力。

49、认为自 1997 年以来连续五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平均数掩盖了许多矛盾，一是非农业的劳动收入掩盖了农业的低收入；二是在农业中养殖业的收入掩盖了种植业的低收入；三是在种植业中经济作物的收入掩盖了粮食作物的低收入；四是在地区间东部的收入掩盖了中西部的低收入。研究和制订政策必须重视被掩盖的低收入部分，作具体分析，不要只看平均数。

50、认为中国改革成功，其基本经验为：一是以农村是薄弱环节做为突破口，易于取得进展；二是以市场经济为取向，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也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三是方法上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可进可退，风险小；四是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选择；五是注重实践，因地制宜，不强求一致。

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为：一是解放思想；二是群众创造；三是专家总结；四是领导认可；五是政府规范。这样的改革自然是成本低、风险小、效益好。

51、认为在农村改革中，尊重农民的意愿与选择以及保障农民的利益是关键。农民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成败决定于农民能否认同和支持。农民的四大创造都是农民自己做出的选择，这就是：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这些改革都是对原由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观念的重大突破，党中央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念和调整政策，努力实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要求。

52、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一切从群众中来，把群众的实践经验总结起来，形成新的理念和政策，再回到群众中去检验，不断修正不合时宜的理念和政策，这样就可不犯或少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随时坚持真理，又随时修正错误，就会收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实效。

53、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上层建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显示出不协调的矛盾，突出表现在政府部门林立，机构重叠，层次繁多，资源垄断权力大，必然会产生扯皮与矛盾，不但管理成本高，工作运转效率低，官僚主义多，而且还会滋生腐败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性政府机构改革先后经过 1982、1986、1993、1998 年的四次，虽然有些小的变化，但不成功，关键是尚未改变机构庞大和层次多以及政府的职能调整不到位的缺陷，因而成效不大。改革的难点在于权力的调整，向自己开刀，往往由于“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权力在手，寸步不让”而使改革夭折。这一点是绕不开的，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需要有强大的政治魄力和胆识，采取革命性措施，推进这项改革。

54、认为在农村普遍实行村民自治以来，虽然效果不尽如意，但总体框架已经建立起来，需要继续完善。在取消农业税和三项提留五项统筹费以后，基层干部长期以来的从事“三要”（命——计划生育、粮、钱）已逐渐消失，目前与农民的矛盾主要是第四要，即要地，需要妥善解决。在进入后农业税时代，基层特别是乡镇政府的干部何去何从，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层次看，目前为中央——省——市——县——乡——村（为自治组织，称为准政府）六级，吃财政饭的人员（包括行政与事业）与供养人员的比例为 1：26，是很罕见的。市财政改为省管，乡财政由县管，为精简地市和乡镇两个层次创造了条件。但乡镇的七套班子（党委、政府、人大主席团、政协联络处、武装部、纪检

委、政法委）以及各部门的七所八站，吃财政饭的编制人员为 30 人，实际有的高达 300 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不能全部足额到位的情况下，为维持正常运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举债，二是农民负担反弹。因此需要总体设计改革方案。小村并为大村，小乡并成大多，合并一些机构，精简一些人员，能有一定成效，但都是治标之举，而不是治本之策。最终是把村民自治制度延伸到乡镇，实行乡民自治，实现四大民主。

这项改革也应先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后逐步扩大。有的地方对乡镇实行“两票选举”是一种好的尝试。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自上而下推进，否则“下动上不动，越动越被动”“下改上不改，改了也得改回来”。

55、认为有些地方为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提出“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用意是好的，但不确切，容易产生误解。农业工业化是指推行现代农业，而不是否定农业，农村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不是否定农村，农民市民化是指城乡居民一律平等享受国民待遇，而不是否定农民。农业、农村、农民是会永远存在的，变成现代农业、现代农村和现代农民。中国农民最终完成由“世袭农民”——“两栖农民”——“现代农民”的历史性转变。

56、认为在中国加入 WTO 以后，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农业也应实行“走出去”的战略，开展农业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政治外交服务。应分三个层次，一是同周边国家开展农业合作，包括西北向中亚和西亚国家的“走西口”；东北与内蒙古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合作；东部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用“绿三角”代替“金三角”。二是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有很强的互补性，能够实现双盈。三是同发达国家合作，可以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合作包括产品贸易、科技服务、劳务输出、承包工程、投资项目、人员交流等。

认为在国际化大潮中，应高度重视弘扬民族文化，兴办民族产业，创造民族品牌，发挥民族优势。应把开发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即把硬资源与软资源结合起来，形成有民族特色的产业和产品，走向世界。应戒骄戒躁，保持忧患意识，勿亡国耻。国耻包括被侵略战争中的“割地赔款”，经济上的“出口转内销”，文化上的“墙里开花墙外香”。不要把自己的国宝（如中医中药）当垃圾，更不能把别人的垃圾当国宝，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自卑感。

57、认为在市场化大潮中，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两面性。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又是诚信经济和法律经济。在竞争中会优胜劣汰，但应依法在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下竞争。既要发挥“看不见手”的作用，又必须有“看得见手”的约束。现在各种媒体大肆宣扬“商场就是战场”，“商战就是你死我活”，为了“竞争”可以不择手段，甚至采取不道德的欺诈手段，以至商品经济大潮中产生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良莠不分的恶劣现象，尤其对青年危害极大，应予高度关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注入我国各民族悠久的传统优秀文化。在这方面，农村比城市具有更多的优势。

58、认为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既区别计划经济，又区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虽有共性，但又有个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现在我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可以说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能犯急性病，欲速不达，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很深刻的，应当记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和手段都应有社会主义的特点，包括注重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注重诚信与公平，而绝不是尔诈我虞。所有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有国有经济，而资本主义也有国有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最需要警惕的是党政官员利用权力打着

国有企业的旗号，将国有资产转为己有，形成特殊的“权贵经济”，这是最可怕的。

59、认为从事高层政策研究的部门和工作人员，当好领导的参谋，避免决策失误，必须亲自到农村第一线调查研究，到农民中了解真实情况，总结实际经验，掌握第一手材料，做到心中有数。常说，三个月不下去就没有多少发言权，政策的真正营养源在基层和农民。农民虽然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但思维文化素质是很高的，能够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妥善解决，如在很短时间内把土地分到各户。农民的语言是很丰富的而且也很贴切，如“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等。比我们说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要深刻。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实施农民教育时说，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欲化农民，必须先农民化。陈云同志强调，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用10%的时间做决策研究。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如无不同意见，应假设不同意见，加以论证。只有这样才会避免“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而使决策失误。

60、认为从事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一定要坚持“三言”原则，即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实事求是，反对说空话、套话、废话等不正的文风。由于我国各地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甚大，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切忌一刀切。在研究问题时，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解放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必须同现实情况密切结合，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

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终久要为社会主义取代，就像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取代一样，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离开或违背了它，就要犯错误。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左”派幼稚病、空想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以及急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等理想和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实践是理论的来源。离开实践的“理论”，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会有生命力。主观认识反映客观，这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局限性，又往往不能完全正确地认识与反映客观，因而导致错误。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话并不确切，严格说，包括历史上的先哲都不是无过错的完人。还是另一句话说的好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改为“人虽圣贤，孰能无过”更为符合实际。这样就会对包括“圣人”在内的伟人有一个平常而又平静的心态，不会盲目崇拜甚至迷信，不会感情冲动，不会苛求伟人，不会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才能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不断调整主观的认识，不断前进，不断创新，推动历史发展。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06年5月14日）

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初心和使命

——纪念陆学艺先生逝世十周年

景天魁

陆学艺先生逝世十年了。这十年间，我不论在白天还是梦里，都无数次地向他汇报，确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他的意愿。汇报最多的是我近十年来所做的群学研究。当前，我们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回顾陆学艺先生当年有关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思想，应该说他在这方面有先见之明，对今天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一、不忘初心：研究群学

2013年老陆逝世后，党中央经常提醒的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我从哲学研究转到社会学研究的“初心”。

大概从1990年开始，老陆就动员我转到社会学所。刚开始，我并没有动心。我本科、硕士和博士期间都学的是哲学，在哲学所也很顺利，破格晋升了职称，担任了哲学所由两个研究室合并而成的人数最多的研究室的主任，还在老先生众多的老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当了年龄最轻的委员，可以说志得意满。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立志当一个哲学家，为什么要舍己之长，转到社会学所呢？包括我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不支持。不料，当老陆把他的想法与我充分交流之后，我慢慢地心动了。社会学界都知道老陆是著名的“三农”专家，其实他本来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1962年，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到哲学所容肇祖先生门下读研究生，并留在哲学所工作。他担任社会学所所长后，仍然对中国社会思想史非常重视。他在动员我到社会学所时经常谈到，中国社会学，要高度重视对中国自己的社会思想资源的研究，不仅研究西方理论，还要研究中国社会理论。他希望我到社会学所新建一个中国社会理论研究室，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但因为哲学所坚决不放，调动的事拖了大约5年，直到1995年院里调我到社会学所担任副所长，哲学所才不便阻拦了。

但我刚到社会学所，院领导就要我承担国务院交办的一个社会保障课题。那时候，社科院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在做社会保障研究，哪个研究所都还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障研究室。我那时也根本不懂社会保障，社会学所很快从民政部挖来两个熟悉社会保障的人才杨团和唐钧，组建了社会保障室。我们联合香港两位专家，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了那个课题，出版了《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书，这在当时还是比较早的。转眼进入21世纪，胡锦涛、温家宝那届中央领导很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2003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7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以后制度建设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连同其他制度都建立了，到2012年中央宣布建成了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

研究和讨论，我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作为一个农民子弟，既然有参与制度讨论特别是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机会，我如果不竭尽全力，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老陆看我一心扑到社会保障研究上了，他自己也带领很大的课题组投入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查和研究，当初关于中国社会理论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设想就搁置了。尽管如此，老陆还是在 1999 年，主持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他亲任理事长，叫我和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担任副理事长。他和王处辉组织全国高校从事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专家花了多年时间，编纂了多卷本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资料汇编。我虽然没有做多少具体工作，但会议讨论还是参加了几次。老陆和王处辉主持的这套书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应该具有奠基性的地位。

也是在 1999 年，春节期间我到费孝通先生家拜年，他把刚出版的《从实求知录》题赠给我。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领导恢复重建社会学 20 年的反思性总结。在这本书中，费老一再提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在燕京大学讲学时的一个重要论断：社会学这个学科是由中国荀子在战国末期创立的，比 1838 年孔德提出“社会学”之名早了 2 千多年。此一石破天惊之论，在场的中国学者没有一个人回应。一个外国人都肯定社会学这个学科是中国荀子创立的，可是当时燕京大学的中国学者却没有承认，也未见到有人来做做研究、搞搞清楚。直到 60 多年以后，费老指出，搞清楚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前途”。很显然，如果肯定荀子创立了社会学，那么中国社会学就有了本土的“根”，中国文化的“根”，就不必到孔德那里去“寻根”了，中国社会学史就不能从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写起了，兹事体大，确实关系到“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前途”。费老一再表示自己很想好好研究荀子，他说：“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值得认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标。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¹这是当时已近九十高龄的费老对我们的殷殷嘱托啊！费老的嘱托我铭记在心，陷入了苦苦的思索：我是学哲学出身的，过去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说荀子是哲学家，怎么能证明荀子创立了社会学？什么是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界限？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社会学的头面人物就断言“中国本无社会学”，社会学是“舶来品”。此后，所有的教科书、所有的中国社会学史著作，都是从清末民初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写起，“中国本无社会学”已成定论，没有人怀疑过。我当时到社会学界只有 3 年半时间，也没有胆量翻这样的铁案。

直到老陆逝世之前，我自己仍没有下决心投入群学研究。老陆 2000 年到北京工业大学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后，见面交流的机会也少了。2013 年，老陆不幸逝世后，我经常想起他当年调我到社会学所的“初心”，也不断体会费孝通先生把他的重要著作题赠给我的心意所在。我坚信，研究群学，他们二位肯定是赞成的。特别是我发现，早在清末民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最初接触西方社会学时，就认定这门学问中国古已有之。1891 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授的科目中就有“群学”。到严复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之时，发现群学与西方社会学“节目枝条”“不期而合”，²“古人之说与西学合”³，于是将 sociology 译为“群学”。梁启超也肯定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认为群学“与欧西学者

¹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4 页。

² 严复：《原强》，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 页。

³ 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74 页。

之分类正同”。⁴他还曾立下宏愿，计划写“《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⁵的巨著。被誉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是我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崇敬的，我惊喜地发现，他在1902年著有《群学说》一文；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师培先生早在1905年的《周末学术史序》一文中，就肯定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即使按照西方近代划分学科的标准，也至少有16个学科，其中就有中国社会学。前辈们的这些研究坚定了我的信心：论证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不是我别出心裁，而是继承康、严、梁、蔡、刘等先贤的未竟事业。当然，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只是肯定了群学，事实上把它视为中国古典社会学，但基本上没有做出论证。我的任务是在学理上加以论证，但这不过是“接着说”。既然我们有群学，而且前人已经肯定群学就是社会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研究、不搞清楚呢？

研究群学这件事被我整整延宕了15年，回想起来，深感自责。好在2014年正式启动后，得到了学界同仁的积极支持，我们的项目开始时只有28人，后来陆续参与者有近百人，集体奋斗了10年，到今年终于完成了《中国社会学史》六卷11册，550多万字。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实现了费孝通、陆学艺先生当年对我寄予的厚望。

二、史论法均衡：学科建设的基础

强调“（历）史（理）论（方）法”是一个学科必备的基础，是早就有的说法。虽然不是陆学艺首先提出的，但却无疑是他特别重视的。在我到社会学所之前特别是来了以后，我俩经常谈到这个问题。最初老陆动员我到社会学所就是从这个基本认识开始的。一个学科与一个人不一样，一个学者可以根据个人之所长，只要在一点上有突破，就可以崭露头角；单位和单位也不一样，一个单位如果人员不多，也难以做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以及史论法之间的均衡。但是，社会学所人员多，期望值高，做到史论法均衡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史论法均衡虽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但史论法的排序有讲究。把“史”放在第一位，把“法”放到最后，这个排序与社会学的学科现状正相反。把“法”放到最后，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而是说“方法”要真正运用得好，必须以历史和理论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方法也不过是纯粹的工具，所做的研究不会有深度和厚度；而把“史”放在第一位，其实是强调研究的积累性和继承性，有继承才能有积累，有积累才有厚度和深度。依靠历史和理论，方法就可以如虎添翼。这对一个学科走向成熟非常重要，其实这也是中国学术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我们总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的古老文明、中国学术博大精深，这是怎么做到的？与一代又一代学人自觉的传承意识有很大的关系，这是重要的保障条件。缺了这一条，所谓“绵延不绝”“博大精深”，断无可能。所以，我在2020年社会学所庆祝建所40周年时的题词就是“史论法均衡为好”，我也向所领导写信提了这个建议。我在陆学艺逝世十周年时再提这一点，主要是因为这是老陆很重视的学科建设思想。

三、牢记使命：农民问题

在我看来，陆学艺“三农”思想最闪光之处，也是一个一以贯之的重点，就是他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他经常强调研究“三农”问题不能“见物不见人”，重视农业就是向农民要粮食，

⁴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总第1317页。

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总第136页。

粮食一多就”谷贱伤农“，吃饱了饭，就把农民忘了。他把这种情况叫做”扭秧歌“。尽管我对“三农”问题研究不多，但与老陆共同关心并且讨论较多的主要是农民问题。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1994年我还在哲学所时，老陆叫我和他一起到中南海，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向我们交代了一项任务，说是中央准备召开一次以农民问题为主题的农村工作会议，叫我们准备一个会议文件。和我们一起接受这项任务的还有中央党校一位教授。温家宝同志非常清晰明确地口授了一个提纲要领，要求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的论述讲起，一直写到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农民角色地位等现实问题，要我们三人分工撰写。我们都很重视，我很快把自己承担的部分写出一个初稿，交给了老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老陆告诉我，中央还是延续一贯的”三农“问题一起研究的农村工作会议的开法，那个专门讲农民问题的稿子不用了。次年，我调到社会学所，首先做的就是太仓调查，我关注的重点是苏南农民的身份变迁。老陆逝世以后，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高鸽同志在整理老陆的文字资料时，偶然发现了我的那个关于农民问题的稿子，老陆在稿纸的背面标明”景天魁 1994 年稿“。我喜出望外，这既引发了我对那段往事的回忆，又激起我继续研究农民问题的使命感。从 2016 年起，我邀请在常熟理工学院任教的老陆关门弟子周艳博士、常州市委党校张丁榕等，稍后又增加了南京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顾金土教授等，一起写一本研究老陆的家乡苏南的专著，我个人较多关注的是农民对乡村工业、农业对工业的贡献，并多次到无锡、昆山、江阴、溧阳、武进等地调研。只是由于近几年我要完成中国社会学史的项目，苏南研究进展较慢。我们肯定会继续努力，尝试将群学和时空社会学视角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区域综合研究方法论，以继续陆学艺学术事业的实际行动，告慰和纪念他。

十年来，我所做的事情，即便做得不大好，但我相信所做的这几件事情一定是老陆希望看到的。在纪念陆学艺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经过高鸽、钱伟量等同志多年的艰辛努力，《陆学艺全集》正式出版了，意义非常重大；今天，陆学艺的老朋友郭书田、张晓山等先生也亲临现场表达深深的怀念之情，老陆的学生和学术界众多朋友也莅临这次纪念讨论会，老陆的在天之灵，一定倍感欣慰。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23 年 5 月 8 日定稿）

话说萧克

徐庆全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弹指间，十四年就过去了。十四年来，我常常能够想起这位和蔼的老将军；读书看报，只要“萧克”两个字映入眼帘，常常要驻留、沉思片刻。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和这位老将军有多么熟悉多么亲近——我连“谬托知己”的资格都没有。按他的说法，我是他的“兵”——他是这样对杂志社员工说的，但我跟他只是有过几面之缘，几次聆听过他的教诲而已。

但，我的确经常想起他。关注他，是对他参与的或者主动推动的那一段历史充满了敬意；关注他，是因为他曾经是我的间接领导，感受过他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品德；关注他，是因为他的教诲至今仍然是我工作或研究所奉行的信条。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

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给萧克一个“军人学者”的称呼，“因为他有着许多精确的事实和数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他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说他的“思维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锐，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无论哪一种评价，都说明一个事实，萧克将军是军中少有的文人将军。

我“印象”中的萧克，也是从这样可以被描绘的图像开始的。记得萧克这个名字是从《红旗飘飘》中“飘”来的。那时，关于长征的宏大叙事是青春男儿的一剂成长猛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走过这段路程的人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让我少年时段对英雄的崇拜格外强烈。

在《红旗飘飘》系列出版物中，曾经有很多关于长征的回忆录，萧克的就在其中。今天，我已经记不清他回忆录标题是什么，但清楚记得的是，标题是手写体——好像张爱萍将军也用手写体。能有这样清晰的记忆，是因为正在青春豪放之际，萧克的字体透着一种不备马鞍就旅行的狂放，张爱萍的字也大致如此，我临摹了好多次。在回忆录中，萧克谈到自己早年练过书法，也谈他在长征写诗的经历，一派革命的豪迈。

后来才知道，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军队中才开始学习文化的，而萧克在加入队伍之前就能诗善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即使在长征途中，诗情也与硝烟相伴随，没有画意但也有一种硬气。

萧克后来果然成为作家。1988年，他写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出版。虽然文坛经历了“伤痕文

学”、“寻根文学”等等挣扎之后，一步一步地在挣脱革命话语体系的羁绊，关于革命英雄主义的题材已经逐渐被边缘，但萧克这部小说还是引起了一些轰动。

我记得先是在广播里听到章节连播才去买小说读的。那时，广播似乎是我这样的读书人与书连接的唯一有效通道。广播里演播什么小说，就去追什么小说。

萧克在接受访谈时说，创作《浴血罗霄》的背景，要从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说起。西安事变后，萧克读了苏联小说《铁流》，书中讲述的俄国工农武装队伍的故事及所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都让他激动不已。萧克想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应该写出中国的《铁流》。经过构思，他决定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的成长历程为故事主线，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从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萧克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在随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三次大修改，多次小修改。此后，就一直保存在行军箱里。

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受到错误批判。为了寻找批判他的材料，这部尘封的书稿被打印出来，装订成三册，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样，“内部”传看。得到这个“善本”，当时他心里真是高兴，就把原来的草稿扔进了火炉。“文革”时，萧克和他的小说又一次在劫难逃。为了批判他，造反派又将书稿拿去油印数百册。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全国唯一一本还没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两次的小说。

1985年底，萧克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作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这部命途多舛的小说。于是，萧克开始修改小说。1988年建军节前夕，小说出版。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青年，变成了81岁的老人。

1991年，《浴血罗霄》获得“茅盾文学奖”。萧克的履历上又添了一条：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他是唯一写过长篇小说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

关于长征中的事

不过，在当年读《红旗飘飘》等回忆录时，我还不知道欣赏萧克或者其他回忆者的文笔，关注点在“排座次”，按照这些回忆录来排每一个人的座次——从军团级开始排起，一直排到连级干部；排每个人所经历的战争——是不是走完了整个长征。排来排去，我和小伙伴们发现，萧克25岁当军长，27岁任第六军军团长，应该是长征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个“大官”。

后来，我跟萧克聊天的时候，特意说到我和小伙伴们这样的座次排比，老人哈哈大笑。当然，话题说到长征，老人兴致勃勃地说：其实，当年第六军团长征的时间比别的军团早，是在1934年8月上旬，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10月。后来才知道，当时，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中央决定六军团和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目的分别是探路和引敌，是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

话题又转到我提到的“排座次”，萧老很严肃地讲到关于林彪的官衔问题。“文革”中，为了“林副主席”继位的合法性，宣传中把“朱毛会师”改为毛与林在井冈山会师——连我这样的小孩也都知道。萧老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事实，绝不能人云亦云。偶尔有人前来调查井冈山会师的情况，萧克也只是说及朱德、陈毅与毛泽东会师，根本不提林彪。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说，还有林彪。萧老回答说：“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那时像林彪这一级干部多得很。”意思是林彪数不上“座次”

的。

说这话的时候，是举国皆知的“林副统帅”如日中天之际。而此时，萧克早已在军中靠边站，处境艰难，持这样的态度，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但是，思想者的“胆识”，让他将这种风险置之度外。

但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973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中央批发的材料中，则又说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萧克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对来访者谈及这一情况时说，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蒋先云牺牲后，干部调整时，林彪即升为连长了。他还给北伐时期曾与林彪一起工作的覃士冕打电话，覃证实了他的记忆。为此，他特意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在讲课中予以纠正。而斯时，林彪已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林贼”，一些人躲避都来不及，萧克居然这样“往上靠”。

1996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萧老应邀为《长征大事典》写序。他在《序》中再一次讲到这段历史。他写道：

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为见习排长了。

接着，萧克严肃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萧克一直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我向萧克提出唐突的问题

1990年，萧克参与发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他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并亲自督促办理有关审批手续。11月25日，他在关于创办《炎黄春秋》的申请报告上批示：“同意。最好快点办理。”

熟知萧克经历和秉性的人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大家以将士请战、受命的心情“快点办理”。1991年3月完成正式出版的审批手续；4月1日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7月1日，第一期刊物面世。

草创时期的杂志社，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写大字报的痕迹。简陋的办公室刚刚布置好，萧克就来视察。他说，办公条件艰苦一点，但还是比延安要好多了。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

社长杜导正将大家——介绍给萧克。萧克既关心着大家的工作，又关心着大家的生活。谈话中洋溢着领导对部属的关怀，长者对晚辈的关爱。

两个月后，副社长宋文茂前往萧克住所请示工作时，萧克还特别嘱咐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

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他还特别说：“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事，都欢迎大家来。”

因为有萧克这“命令”在，我在1994年年初进入杂志社工作时，拜见萧克就成为一道例行手续。

萧克的家在西城区的一条胡同内，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进院后，便来到他的办公室。虽然是寒冬季节，但办公室内点缀的绿植，有一种融融的暖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排偌大的笔架，粗细不同的毛笔悬悬挂着，意境独特。

照例的寒暄过后，我就和老人聊到当年读《红旗飘飘》的事情。关于长征和林彪的话题后，我不知深浅地问到另一个问题：我听说关于您，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话：“××是好人犯错误，萧克是坏人干坏事”，确切否？

萧克似乎陷入沉思。他避开我的问题，谈到和毛关系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投毛反对票。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按照那时的惯例，红四军每召开一次党代会，一项重要的议程是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代表们要从两个候选人中选一个，即在毛泽东和陈毅之间选择。萧克把票投给了陈毅，大多数代表也都投了陈毅的票，而只有林彪等少数几个人投了毛泽东的票，毛泽东落选！陈毅接替毛担任军委书记。毛则到漳州“养病”去了。

陈毅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当时，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周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指示陈毅一定要把毛请回来。根据周的指示，陈毅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请回了毛。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作出了决议——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才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

第二件事，是萧克一次和毛见面的情形。那是1968年“五一”劳动节，萧克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毛回忆起与萧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紧紧握住萧克的手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萧克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三百多杆梭标。”毛听后感慨地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后来，我看萧克的回忆录以及别人的回忆录，讲到不少萧克和毛的关系的叙述。可是，在那天，萧克独独只讲到这两件事，我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想起来，我当时问这样的问题肯定非常唐突，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敢再问萧克。这个问题也至今留存脑海。

关注粟裕和张闻天研究

在1958年那一场所谓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刘伯承、萧克以及粟裕等一批将领被批判。为何将您列为批判的靶子？我问萧克。萧克没有多说。他只是谈到在那场批判运动中遭殃的粟裕。他说，粟裕的平反非常艰难，应该说，中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性的东西出来，这对于粟裕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和事业有大贡献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你要记住，将来有机会，杂志应该写文章来说说这件事。

2003年12月，在粟裕去世二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粟裕的秘书鞠开的帮助下，我去采访了粟裕的夫人楚青，写出了一篇《粟裕平反的曲折历程——访粟裕夫人楚青》，在2004年第一期杂志上头条

发表，算是执行了萧老的“命令”。

不过，萧克的命运我一直很关注。我也草草地梳理过他的历史轨迹，希求从中能得到点什么。27岁，他就是六军团军团长，但此后他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得有些莫名其妙，疑似于“自由落体”：六军团跟二军团会师以后，他受贺龙和任弼时领导，成为副手；长征到陕北之后，他却离开六军团，被调到30军当军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他到120师当副师长；解放战争期间，他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亲自指挥的战役不多。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战将，这种种的无法独当一面的局面，显然是令人遗憾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我也没敢问萧克是否这样看。

萧克非常关注对张闻天的研究。1995年年初，他接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寄送的《张闻天传》征求意见稿。他认真地看了18章以后的大部分章节，给刘英回信，认为应该宣传张闻天。这年5月，在一次筹备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的会议上，萧克特意把我叫到身边说，杂志要围绕着张闻天组一些稿子，这是一位在历史上受了委屈的同志，我们不能忘记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并把他4月11日给刘英回信的复印件给了我。

这封信我至今保留着。我不知道萧克的书中是否收入这封信。这里把这封信公布出来，也可以为研究萧克和张闻天提供一点材料。

刘英同志：您好！来信及书都收到。早收到的张闻天传，自18章以后大部分都看了。我又从别的书报上看到他在六中全会时期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六中全会结束时看过，感到很值得读。延安整风，又受到批评，甚至近乎诽谤，所以前两年又看一遍，也很有教益）。七八年前接到您赠给我和先佛的《回忆张闻天》，当时选读了一些，回想起他以前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等文章，写了一首感怀诗：

斯人斯文

毕生挥翰谈丽珠，
学贯中西智若愚。
秘密公开皆得道，
外交国策具深谟。
庐山迷雾已清览，
法剑神坛早呜呼。
喜见遗文多宏论，
斯人去矣奈何如。

我诗虽然不好，也表现我对这位老同志看法和身后的感慨。再见。

敬礼

萧 克

1995年4月11日

接到萧克的命令，我当然积极去组稿。后来，我找到了张闻天传记组的负责人张培森约稿。他陆续地给我写出了七八篇文章，对廓清张闻天研究中的迷雾，有开拓之功，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位谦逊的思想者

1969年，萧克被下发到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因祸得福”，他在干校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著作，帮他“清理了时下流行的被颠倒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时，萧克在读马恩列斯著作时，写下很多的眉批——他的心得体会。后来，我看到过萧克的这些眉批，实在是惊叹这位老人读书求甚解的精神。1996年7月是建党七十五周年，又恰恰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七十五周年，我们特请萧克将1971年冬写在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书眉上的读书笔记核校后发表。

在笔记中，萧克称赞列宁“最伟大最感人之处，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十月革命四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深刻分析了错误的由来，并提出了切实措施坚决予以改正”。他说：“我重温列宁这些论述，深深感到列宁无论什么时候，对革命事业和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都极端认真负责，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继续做下去，错的便承认错误，切实改正。”

列宁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萧克反复阅读后写道：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自己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

读了萧克的这篇读书笔记，联想到1971年冬国家仍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于萧老这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洞察力和治国安邦的远见卓识，我们能不感叹吗？

我常以“胆”和“识”来区分学者和思想者：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从萧克的胆识中，我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如今，萧老已经去世十四年了，而我，也由萧老眼中的“小编”变成“老编”进而成为“社会闲杂人士”啦。“十日从来九风雨，一生数去几沧桑”，这么说对我这样的平头百姓有点“大”，但在岁月流逝中，对萧老的话倒是有了更多的体会。这，也是我时常想起他老人家的一个理由吧。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知乎，2022年11月27日）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精神心得笔记

丁玉华

（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和本质要求，准确把握前进道路上的重大原则，自觉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担当作为，求真务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今年全国两会是党的二十大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制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已在全国两会上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

从党的二十大到全国两会，蓝图绘就，前程远大，人民豪迈，信心坚定。这信心，来自“两个确立”的根本保证。回望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从党的二十大到全国两会，全党全社会必将进一步把“两个确立”的政治共识转化为“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今日中国，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

核心引领，思想引领，是最有力的引领，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二）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入总结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两个结合”的要求，精辟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产物，以全新的视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202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时强调，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本要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要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党中央确定在全党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主要考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必须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

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把党的创新理论运用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去。要善于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洞察时与势、危与机，积极识变应变求变。

4月3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实抓好主题教育，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他指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令人鼓舞，催人奋进，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要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对外宾说，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中央电视一台播放的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也引用了这句话）

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还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见《邓小平文选》第三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作贡献。（见中宣部副部长在京西宾馆的报告）

（三）

通过学习，提高了对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必须坚持“五个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

必由之路。”“五个必由之路”深化了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成功密码”。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对于进一步筑牢历史记忆、坚定历史自信，满怀信心地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学习认识到，百年党史告诉我们四个历史结论：第一，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和马克思主义命运“两个扭转”的伟大里程。马克思主义扭转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不断下滑的命运颓势，使其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扭转了马克思主义“被终结”的命运，使其迸发出更具穿透力和解释力的真理力量。第二，这是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的伟大里程。中国不走帝国主义强权之路，不走依赖别人附庸之路，以和平自主、稳定持续方式发展起来，依靠自己的辛劳和汗水创造美好生活。第三，这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两个革命”的伟大里程。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两个革命”同时发力、相互促进，确保革命事业发达、革命力量朝气蓬勃。第四，这是把握中华民族复兴和世界文明进步“两个大局”的伟大里程。四个结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党的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四）

坚持稳中求进，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五条重大原则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强调的是领导力量问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旗帜引领，强调的是前进方向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根本立场，强调的是发展目标问题；“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是活力源泉，强调的是发展动力问题；“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精神力量，强调的是奋斗状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作为一条现代化新道路，对于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必由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实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创造的一条新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我们党

的一个伟大创造。

（五）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民族要振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面性任务，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国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后，我们要继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足富足，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进行机构改革，将国家乡村振兴局的任务合并到农业农村部。我阅读了唐仁健同志在中央《求是》杂志 2023 年第 6 期上刊登的文章《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切实抓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又阅读了唐部长在农业农村部《老干部园地》上刊载的《锚定目标铆足干劲，奋力建设农业强国——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解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两篇文章都很好，很受启发。在此，我想起当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廖鲁言同志任农业部长，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工作。周总理说，你任农业部长侧重于生产力方面的工作，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侧重于生产关系方面的工作。当前，农业农村部既抓生产力，又抓生产关系，整个“三农”工作一齐抓，任务非常重，机关同志们很辛苦。作为一个农业农村部离退休老干部，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我们生活很好，感谢党和国家对老干部的关心，同时也感谢农业农村部对我们老干部的照顾。我们一定认真学习，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作者：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老干部。2023 年 4 月 10 日）

籽粒苋作为蛋白质饲料源以取代豆粕饲养肉牛

初步显示良好前景

——以广西百色地区养牛户种苋取代豆粕营养源的替代效应为例

卢洪华 孙鸿良 岳绍先

【摘 要】：

本文以实例证实了籽粒苋优良品种的蛋白饲料粉取代豆粕蛋白，对肉牛有较好的营养替代效应，使当前某些养牛村解除了困境，使养牛的经济效益增大。在旱薄地上种苋养牛不仅生产了可观的蛋白饲料，而且改善了土壤生产性能，还运用生态工程技术及机械化创新技术与智慧农业，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同步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籽粒苋、苋蛋白饲料、豆粕蛋白、替代效应、解决困境、可持续发展

1、蛋白质饲料缺乏问题的提出与以苋蛋白取代的实况

广西百色地区田东县等农户有养牛的传统，但近年因缺乏蛋白饲料来源而举步维艰，常常是辛辛苦苦养一头牛在 10 个月出栏时，利润仅 9000 元左右。而为了蛋白饲料每头肉牛就要付 400-500 元作为购买豆粕费，况且依靠进口豆粕有不稳定性问题，使饲养户压力极大。据此，为了振兴农村寻找可以取代豆粕类的植物蛋白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022 年在我们推荐下，农民们开始试种中华籽粒苋。这里的土地多为旱薄地，以种甘蔗为主，产量极低，每亩净收入不到 1000 元。在这样土地上种植中华籽粒苋后，3 个月可获得亩产 8-15 吨的青鲜饲料（图 1），而其干物质中粗蛋白含量可接近紫花苜蓿水平^[1]而可替代豆粕，这种替代豆粕的浓缩蛋白饲料试喂肉牛后，取得了初步成功。实践证明，每亩苋的青饲料可代替豆粕喂两头牛，而且可使牛提前一个月出栏。如扣除提前一个月出栏节约的饲料费，则比常规饲料喂养净收入多赚 3000 元以上。据此，激发了广大农民种苋养牛积极性，养牛村的农户由原来每户饲养十数头至今纷纷上升到 30-50 头，使养牛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2、优良品种与主要的种植生态工程技术

2.1、籽粒苋优良品种的来源及特性

籽粒苋是千穗谷、绿穗苋、尾穗苋以及国外红苋等苋科苋属苋种的总称，我们向农民推荐的是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从世界籽粒苋育种中心——Rodale 有机农业研究中心引进的红苋 (*Amaranthus cruentus* L.) R104 杂交种, 经作物所 11 年在国内多地试种与定向培育后, 于 1991 年通过了作为引进品种的国家审定的优良品种之一。之后又在和谐城镇化建设公司与中国农科院协作下在全国若干试点及共计上万亩试验地上, 经 20 年进行试种与定向培育而成的, 适于在我国各地发展的红苋 R104 的优良品系, 暂定名为中华籽粒苋。

中华籽粒苋有如下特性: ①高产^[2] 全生育期高度达 4.5-5.0 米, 亩产鲜茎叶可达 20-30 吨, 农民有“给我 3 个月, 还你一片林”之称(图 1); 而最佳收割期则为孕穗前期, 此期含蛋白质较高, 亩产鲜茎叶 7-15 吨, 且叶片丰富而不落叶; ②蛋白质含量高^[3] 孕穗前期茎叶全株粗蛋白可达 28.6%*, 而且蛋白质质量较高; ③抗逆性强^[4] 可在一定逆境土壤上生长, 抗旱、耐盐碱、耐土壤瘠薄而且可节水灌溉, 其耗水量只需玉米灌水的 50-60%左右; ④播种量极低^[5] 一亩地种子播种量仅需 8-10g, 节粮且节约播种投入成本。

2.2、种植的生态工程技术主要内容

2.2.1 按叶蛋白最佳生育期进行刈割

据苋茎叶生长期中其蛋白含量的变化趋势, 是随着生育期的增长, 叶部蛋白含量是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过早收割则叶蛋白质含量较高但产量不理想, 到孕穗开花季节则叶蛋白大幅下降。据此找寻最佳刈割期是关键。美国为了在一些地区种植苋作为夏季牛的放牧场, 也研究了最佳放牧期的茎叶比, 结果是叶的重量要占全株 50%以上为最佳^[6], 这时可收获足够产量与一定的叶蛋白。我们引导农民在苋出苗后 3 个月内收割也正值孕穗前期, 亩产叶茎青料一般可达 7-15 吨; 此时全株蛋白含量可达 21-24%, 而且喂饲后可节约饲料粮 30-45% (可不必另喂玉米粒), 节约饲养成本 10-20%。

2.2.2 按籽粒苋叶蛋白的替代效应, 找寻最适喂饲量

替代效应包括饲喂后的养分利用率、消化率和饲料系数等。有人研究了绿穗苋叶蛋白浓缩液 (ALPC) 替代鱼粉的营养特性和适宜性, 饲喂了尼罗非鱼 160 天后证明了用 ALPC 喂鱼可替代高达 80% 的鱼粉, 不会影响 *miloticus* (尼罗鳄鱼) 的生产性能^[7]。我们在肉牛饲料组成上, 苋茎叶占 60% 也有基本上合适的“替代效应”。虽然在配方上只使用了苋干草的 60% 而加上其它杂乱秸秆与杂草共 40% 的情况下, 饲料蛋白含量降为 12%, 也可为牛提供了足够的蛋白营养。同时与过去农民一贯只用 10% 的豆粕与 90% 玉米秸秆与杂草纳入饲料使蛋白质的含量也仅 12% 相似, 疑似具有一致的替代效应,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2.3 增施有机氮肥有利于叶蛋白增产

籽粒苋为喜氮肥作物, 种苋必须增施氮肥无论对生产力与茎叶中的蛋白质含量皆有明显增长作用。有人在对施氮对苋饲料营养价值影响一文中, 也确定了随着施氮量的增加, 苋茎叶的粗蛋白质、纯蛋白质、粗脂肪及 P. Na. k. SP. P 硝态氮草酸、可溶性草酸、A、B1、B2、硝酸盐等等皆有所增加^[8]。在生态工程技术指引下, 我们推荐了用有机氮的专用肥, 其原料仍为部分不大新鲜的苋茎叶, 粉碎后放土窖内发酵。专用肥的组成为苋的茎叶占 60%, 畜禽粪占 20%, 鱼塘土占 20%。经 45 天发酵后施于土中,

* 测试单位为华中农业大学以及湖北省农科院饲料测试中心, 下同

每亩只需 100 公斤。然后在苋的两个关键生育期再施用飞机喷洒氮的叶面肥，可使苋茎叶生长速度大为增快。

至于高氮肥条件下易引起苋青体草酸与硝酸盐含量增高而不适于饲用的问题。其实不同品种有不同效应，为防止中毒现象应选用那些低硝酸盐积累型品种为好；况且不同生育期其含量也有变化。上述作者^[8]也指出了当苋种植 40 天后，体内硝酸盐有一段含量增高，此期应限制为反刍动物作饲料；但生长至 60 天时，尽管消化率和粗蛋白质含量有所下降，硝酸盐含量也有所降低，又有条件作为反刍动物饲料。我们提供的中华籽粒苋则未见中毒现象，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2.2.4 虫害的消灭不用农药而试用自制有机药液

在苋的茎叶生长期中有一个快速生长期，大概在出苗后 50-60 天，茎的生长速度可达到最大值，此时虫害也随之而来，特别有一些昆虫的肉质幼虫有时一夜之间可使全株叶片变成鱼网状，因此及时灭虫十分重要。我们肯定了群众在利用的烟草秸秆液汁（占 25%）+菠萝叶渣（占 5%），兑上苋水（占 70%）的治虫专用液，有一定效果。

3、全部机械化的创新技术，使种苋养牛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了使收获的优质苋青料尽快加工成浓缩蛋白干粉，过去我们曾设计制造三筒式烘干机可用中温快速烘干苋鲜体，而制成优质草干草粉或颗粒饲料，其苋全株干草的粗蛋白含量平均可达 23%左右，特别是要在控制中温 60℃ 以下，免得过高时破坏有关营养成分。这些饲料曾饲养猪、牛、羊、鸡、鱼、虾皆适，平均节约粮食饲料 30-45%，降低用工量 80%。这样每亩苋的净收入可达 0.8-1 万元。

而今我们更利用冷链分离技术，使植株的水汁与干物质全部分离回收，而充分保护资源不流失。这样的苋水可作为高营养饮料源回收，内含多种微生素，微量元素与蛋白质等；另干物质可作为蛋白粉进一步处置，其含粗蛋白一般为 18.97%，可作为牛、羊、猪、鸡的蛋白饲料。由于这种蛋白营养价值较高，养牛后由本来 10 个月出栏而缩短为 9 个月出栏，也就是 9 个月的牛可出售 36000 元，相当于每头牛的净收入多赚 3000 元以上。养牛户有时种的苋青体自家用不完，也可以每公斤 0.5 元出售，如自养 50 头牛以上的农户肯定自家耕地不够，另购买苋饲料花一笔钱以及雇用工人等费用，50 头牛净收入还可达到 60 万元。

应当指出，苋叶蛋白粉的质量比豆粕为高，除去在氨基酸组成上苋体含营养价值高的赖氨酸外，而且还含名贵的角鲨烯成份。角鲨烯含有较高抗氧化剂含量，近年不少研究者指出苋的提取物具有消炎作用。有的文献指出籽粒苋中植物蛋白在水解过程中会产生一种 SSED1KE 肽，SSED1KE 肽能有效治疗小老鼠因食物过敏引起的炎症，证实籽粒苋提取液具有一定消炎作用^{[9][10]}。据此，肉牛喂苋体后很少发现炎症现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此因，有待研究。

还令人注目的是与生态环境的逐渐改善。首先环境上没有化肥、农药的污染，其次对原来的甘蔗旱薄地经 2-3 年籽粒苋的种植，土壤生产性能改善，可由低产田变成中、高产田。这样的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发展，展示了生态工程技术与智慧农业建设的新面貌，使整个农业生态系统与生态环境建设能同步向可持续发展，使农民走向了富裕，其前景无可限量。



图1 “给我3个月，还你一片林”（每亩可产15-20吨的青鲜蛋白饲料）

【参考文献】：

1. 岳绍先 国外籽粒苋研究概况《籽粒在中国的研究与开发》（M）1993：344-348
2. 卢洪华 一种新的植物蛋白作用——籽粒苋及其产业化《中国种业》2020年11期：123
3. 岳绍先 孙鸿良等 籽粒苋的营养成分及其应用潜力《作物学报》1987年13卷第2期
4. 孙鸿良 郝凌宇等 籽粒苋抗逆特性及其开发优质高效青饲料的关键技术《中国饲料》2017年17期
5. 孙鸿良 岳绍先 籽粒苋饲料喂饲畜禽的增产节粮双赢现象及其营养功能效应《中国畜牧业》2019第21期
6. Whitehead, W.F., Terrill, T.H., Singh, B.P., (2011) Amaranth Productivity and Nutrient Composition in Central Georgia, Conference proceeding at the XIX International Grassland Congress, Sao Pedro, Sao paulo, Brazil: Fed. 11-21, 21, 2001.
7. Ngugi, C.C., Oyoo-Okoth, E., Manyala, J.O., Fitzsimmons, K., & Kimotho, A. (2017).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nutritional quality of amaranth leaf protein concentrates and suitability of fish meal replacement in Nile tilapia feeds, Aquaculture Reports 5 (2017); 62-69.
8. F.F. Dinssa, R-Y. Yang, D.R. Ledesma, O. Mbwambo, P. Hanson. () Effect of leaf harvest on grain yield and nutrient content of diverse amaranth entries. Scientia Horticulturae. Volume 236, (16 June 2018), Pages 146-157.
9. Wesche-Ebeling, P., Maiti, R., Garcia-Diaz, G., Gonzalez, D. I., & Sosa-Alvarado, F. (1995). Contributions to the Botany and Nutritional value of some wild amaranthus species (amaranthaceae) of nueva leon, Mexico. Economic Botany 49(4): pp. 423-430.
10. Olumayokun A. Olajide, Babatunde R. Ogunleye, and Temitope O. Erinle. Anti-inflammatory Properties of Amaranthus spinosus Leaf Extract. Pharmaceutical Biology 2004, Vol. 42, No. 7, pp. 521-525.

（作者单位：卢洪华，和谐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孙鸿良、岳绍先，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2023年5月24日定稿）

总书记这样和青年谈心

新华网

年轻充满朝气，青春孕育希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青年人的成长，他是青年的引路人，也是青年的知心人。

2013 年

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青春回忆。

2014 年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2015 年

学生时代是美好的，同学们在这里积蓄奋发力量，每一寸光阴都很宝贵。各行各业需要大批科技人才，也需要大批技能型人才，大家要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2016 年

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当看客，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让青春年华在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2017 年

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

2018 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2019 年

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2020 年

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2021 年

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2022 年

希望广大青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

复兴梦想在召唤。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激扬奋斗青春，担当时代重任，让青春年华在奋斗与奉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

（来源：新华网，2023 年 5 月 3 日）

今日小满

——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

李文平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美学和生活智慧所在。小满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

此时节，温度、降水都开始增加，北方大麦、冬小麦等作物籽粒已经结果，渐饱满，但尚未成熟，所以称之为小满。每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视太阳到达黄经60°时为小满。

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靡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节气中，苦菜已经枝繁叶茂，而喜阴的一些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此时麦子开始成熟。

在万物“小得盈满”时，仍然有植物枯死，古人认为靡草是至阴之所生，所以不胜初夏的阳气而枯死。

在二十四节气中，很多节气都是相对的，比如小暑对大暑、小雪对大雪、小寒对大寒，但是小满之后却是芒种，因为对中国人来讲，大满是犯忌讳的说法。在国人看来：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花未全开，月未全圆，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接受小满，接受不完美，就是接受了现实的人生。老子曰：“大成若缺”就是这个道理。

小满不是不思进取，而是长足的努力。有缺憾才能有进步，勉强求全，其实是固步自封。而接受人生的“小满”，是一种宽容和大度，也是一种格局和境界。《易经》有云：水火未济，物不可穷；枯荣有时，兴衰无限。所以说人生的得失是半点不由人的。

小满是知足常乐；小满是淡泊谦逊；小满是大成若缺。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

（作者：农业农村经济研究所产业基地处副处长。2023年5月23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及各研究所
发：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副 主 编：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